

雉与礼的融合

——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



庄恒恺 著



雉与礼的融合

——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



庄恒恺 著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惠存

作者敬奉

二零一六年二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雉与礼的融合：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 / 庄恒恺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08-4017-3

I. ①雉… II. ①庄… III. ①信仰—民族文化—研究—福建省②信仰—民族文化—研究—台湾省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8894号

雉与礼的融合：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

作 者 庄恒恺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鲁数码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017-3

定 价 32.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民间信仰是闽台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闽台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治学重心开始由台湾近代文学转向闽台区域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其时，福建的民间信仰研究正在形成热潮。1995年前后，福建学者徐晓望的《福建民间信仰源流》、林国平、彭文字的《福建民间信仰》、陈小冲的《台湾民间信仰》几乎同时推出，我勉从其后，亦出了《客家民间信仰》一书。20余年间，我也始终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因此，得知恒恺的新作《雉与礼的融合——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即将付梓，作为他的师友，我颇感亲切和欣慰。

本书共分五章，运用“双翼结构”等理论工具，通过对祭厉和冥婚、施孤和普度、五帝和出海等信仰活动的考察，论证闽台厉鬼瘟神信仰中“雉”与“礼”兼具之特点，并考察包括厉鬼瘟神信仰在内的闽台民间信仰与政治权力、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细读书稿之后，我认为本书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选题精准。虽然近年来大陆的民间信仰研究方兴未艾，但闽台厉鬼瘟神信仰远算不上所谓的“学术热点”，可谓是一个边缘的论题。但是边缘并不意味着不重要，相反，从自然科学上看，边缘是新技术、新发明、新学科产生的源泉；而以人文学科的角度观之，边缘往往展现了学术研究中一种更为开阔的视角。恒恺敏锐地意识到，闽台民间信仰的信众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民间信仰活动将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移民与当地社会、典章制度与民间习俗、精英与民众等联结在一起，是研究闽台区域社会的理想切入点；而厉鬼瘟神信仰作为闽台民间信仰的一种特殊形态，又是研究闽台民间信仰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他由此入手，通过厉鬼瘟神信仰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与形态，探讨其与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社会群体、制度化宗教、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例如，他梳理了有关厉鬼瘟神的文献记载，论证了闽台地区这一信仰的发达与其移民社会的特点有关；他考察了冥婚的历史、形式与意义，指出这一习俗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社会宗法性家族制度的要求；他在探讨普度和出海等信仰活动时，考察了其中的经济因素以及组织者、参与者的身份，揭示了此类活动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他分析了底层民众信仰的心理需求因素，指出民间信仰是民众在物质、精神生活短缺状况下的心理慰藉，

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等。选择边缘论题，还有助于多学科研究方法地运用。在本书中，恒恺对于多个学科的理论 and 概念，进行了合理地继承与借用。例如，在论述人与鬼的关系、迎神赛会模仿社会等级的问题时，他分别借鉴了人类学有关“‘报’的规范”和“人情与面子”等研究成果；在梳理民间传说对于瘟神形象的塑造时，他借用了民间文学中“母题”的概念；他还亲身进行田野调查，采得口碑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现场。凡此种种，都展现了他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学术方法。

其次是史料广博。史学虽然不等于史料学，但必须以史料作为基础。梳理文献中的各种记载，是还原并展示闽台厉鬼瘟神信仰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但是，由于民间信仰自身非制度性、世俗性、基层性等特点，仅通过传世文献（如官修文献、档案史料）难以了解其源流嬗变。因此，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中，民间史料就凸显了其重要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恒恺在写作中，拓宽选取材料的广度，通过爬梳传世文献和民间史料，发现了大量有关记载。具体而言，他取材的史料主要包括地方志、碑铭、笔记小说、口碑材料等。他特别注意运用已出版的口碑材料，包括曾在福建和台湾生活的西方传教士回忆录、话本小说、竹枝词、民间故事、谚语、歌谣、新闻报道、各级政协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等，还在田野调查中搜集了有关的神明传说。需要指出的是，恒恺在注意民间文献资料的同时，同样重视古代经典文献和王朝典章制度。如在论及官方毁禁淫祠时，他就将官府榜文与地方志、文人笔记的记载相互对照、互相发明。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对民间史料的辨析使用。可以说，本书将传世文献、民间文献与口碑材料有机结合起来，读来给人以贯通历史与现实的鲜活感。此外，恒恺虽占有大量的史料，却从不堆砌材料，通过翻看书后所列参考文献，读者当不难体会他写作中披沙拣金的辛劳过程。附带言之。在生活中，恒恺就是一个爱淘书、爱读书的年轻人，我与他的师生缘也是由书而起。能够将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充分结合，实在是一件美事。

再次是论述深刻。回顾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只是描述民间信仰现象而不作分析，一方面会流于泛泛和浅薄，另一方面则会陷入低水平重复的窠臼。民间信仰长期被视为“迷信”与“糟粕”，饱受批评；西方学者出于文化偏见等原因，过分强调其功利性的作用。对此，我通过考察闽台地区民间信仰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指出：“美德故事与灵验传说、纪念性祭祀与诉求性祭祀，‘崇德’与‘报功’构成了民间信仰的双翼结构”；亦曾论及：“……‘礼’的穿插和充弥才真正构成了闽、台雉祭的特色。”恒恺紧扣“融合”的题眼，在书中充分论述了包括厉鬼瘟神在内的闽台民间信仰的多重维度，展现了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他虽自谦“理论分析基本上是点到为止”，但我以为，其所“点”之处大都深刻且有新意。例如，在研究“由厉至神”的个案时，他指

出：个别厉鬼成为神明是出于民众的恐惧，但若以“双翼结构”来考察，因其没有“美德故事”，失了一翼，所以信仰传之不久，只短暂兴旺了一段时间；又如，在论及迎神赛会的正面意义时，他认为迎赛活动体现了民众信仰意识的变化，扩大了民众的社会参与，而且具有文化传递和保存的功能；再如，在考察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时，他关注到不同阶层、特别是官员与底层民众的多元化立场，进而合理地解释官方毁禁淫祠流于徒劳的原因等。而他在书末所提出的看待和对待民间信仰的三点看法，更是自己认真思考的凝结，具有现实意义。恒恺不愿人云亦云，也不愿说车轱辘话，全书行文繁简得当，显示了他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理论功底。

总的来说，本书突破了以往民间信仰研究中侧重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范式，将对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考察有机统一起来；以人为本，源流与变迁并重，从多维的角度和不同人群的实践，对闽台厉鬼瘟神信仰做出了综合性的解释。本书亦为全面观察和理解民间信仰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对于完善相关政策、创新社会管理、促进两岸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等现实工作，也将有所助益。

恒恺刚过而立之年，为人善良本分，为学踏实用功。他在高校工作两年多来，在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与集体科研工作的同时，对自己的专业始终抓得很紧。在完成这本书之后，他又开始进行有关民国时期福州民间信仰的研究，力争通过努力，填补这一学术研究的空白点。我为他的成长感到高兴，衷心祝愿并相信他能不断取得新成绩。

汪毅夫

2015年金秋记于北京寓所

内容提要

在闽台民间信仰中，有一种与雉文化相关的特殊形态——厉鬼瘟神信仰。本书将尝试运用“双翼结构”等理论工具，通过对祭厉和冥婚、施孤和普度、五帝和出海等信仰活动的考察，论证闽台厉鬼瘟神信仰中“雉”与“礼”兼具之特点，并考察包括厉鬼瘟神信仰在内的闽台民间信仰与政治权力、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本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阐释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回顾并讨论研究史，对研究方法和使用的材料进行说明。

第二章，讨论祭厉与冥婚。所谓“厉”，即“无后”与“横死”的厉鬼或恶鬼。为了让这些鬼魂“有所归”、不危害社会，古人产生了祭祀厉鬼的习俗，并且在先秦时期即成为国家的重要祭典。明清两朝还明确规定了祭厉的时间、仪式和厉坛规制，其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稳定、辅助统治。但官方未能垄断祭厉渠道，民众自身拥有与厉鬼交通的办法——驱赶与祭祀。民众对于厉鬼的态度，除了恐惧，亦有悲悯和祈福。特别是不少厉鬼升格为祠神的例子，更体现了闽台民众在雉观念上由仇到亲、由威到恩的变化。在闽台历史上，冥婚现象长期存在。作为抚慰孤魂的一种特殊形式，冥婚寄托了为人父母者的情感需要，其功能首先在于使女性免为独鬼，这也是宗法性家族制度的要求；其次在于使未婚而亡的女性免于作祟。

第三章，讨论施孤与普度。“施孤”是闽台民间一种日常祭祀无祀孤魂的祭典。民众对于孤魂野鬼的重视，与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设计有关。生者为无祀孤魂举行施孤仪式，是希望孤魂既不到阳间破坏生者及其家庭的健康幸福，也不在冥界盗抢生者奉献给祖先的祭品。从和尚、道士参与施孤活动，可以看出闽台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混杂的特点。而施孤活动将鬼的形象拟人化，则体现了民间信仰和世俗生活密切混合。民众施孤，固然有对厉鬼作恶感到恐惧的因素，但也蕴含着生者对孤魂野鬼的哀悼和尊重，是一种充满人性关怀的信仰活动。普度来源于制度化宗教，但在唐以后已经成为普化宗教的一种表现。闽地普度包含了焚纸衣、求超荐等孝亲内容。普度是闽台两地旧有的“大雉”之一，举办时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参与者中不乏知识阶层与达官

贵人。普度有社交娱乐功能，由闽南传到台湾的“抢孤”习俗，近年来成为新型文化活动，体现了祠神信仰的进步走向。普度活动中蕴含着经济因素，首先是组织者有利可图，其次是为普通劳动者带来了商机。近代以来，普度风俗因渐趋奢靡而受到批评，但其也具有若干正面作用。

第四章，讨论瘟神五帝信仰及“出海”。“迎神赛会”是指民众为了祈求、酬报神祇举行的临时性或周期性宗教集会。闽台各地的迎神赛会十分兴盛，最为重要者当属“出海”。出海是每年夏末秋初，由福州城内五帝庙所举行的驱瘟活动。关于瘟神五帝的来历，既有论者认为其来自江南的五通、五显，亦有“五举子”说。五帝信仰在福州经历了本土化与正统化的过程。福州的五帝庙数量很多，官府将其视作淫祀，屡次打击但收效甚微。以瘟神五帝信仰为中心的出海，其实质是一种驱逐瘟疫的雉祭。但作为一种迷信活动，其功效仅止于“寄情表意”。出海也具有娱乐功能，比如，“塔骨”神像出游，功能就类似于雉舞。经济因素是迎神赛会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出海所包含的经济活动一是募款，二是放贷。除了组织者和骨干，社会其它阶层的民众也从出海活动中获益。在出海等迎神赛会的仪式中，包含着对社会等级的模仿和对传统秩序的挑战。以往知识阶层对于出海的批评集中在其包含了“贻祸于人”的可鄙意念和“严恪靡费”的浪费行为，但出海等迎赛活动亦有正面意义：1. 体现了民众信仰意识的变化；2. 扩大了民众的社会参与；3. 作为基层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第五章，讨论包括厉鬼瘟神信仰在内的闽台民间信仰与政治权力、社会变迁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神道设教之目的在于维护、巩固统治秩序。辅王化与毁淫祠，构成了神道设教的两面。辅王化表现在：1. 建立祭祀标准。在官方建立的祭祀标准中，特别注意神祇的“忠义”情节。在闽台方志的记载中，因为“忠义”原因被祀的祠神数量众多。虽然“忠义”是历代统治者均主张的祭祀标准，但“忠义”的判断标准是变化的。标准的不一致，使有些已经被官方承认的祠神也受到了非议，对于民众来说，意义更不明显。2. 国家颁布祀典。清朝的祭祀制度体现出浓厚的等级色彩。3. 强化城隍信仰。城隍在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地位，与统治者的推动有密切关系。统治者希望通过强化城隍信仰来强化各级地方官的地位及其行政权力。毁淫祠是官方控制祠神信仰的重要手段。自宋以降，福建官方之毁淫祠行为不胜枚举，但都仅收一时之效。实际上，因为官方的态度矛盾和官员的敷衍，官方的毁禁淫祠常常停留在纸面上。以出海为例，始终禁而不绝。20世纪20—30年代，官方毁禁淫祠的行动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但效果也只是昙花一现。官方毁淫祠流于徒劳的原因，首先是过度的道德标榜，其次是忽略民众的心理需求。最后，就如何看待和对待民间信仰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目 录

第一章 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述评·····	00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001
一、研究对象·····	001
二、研究意义·····	003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与讨论·····	004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材料·····	010
一、理论工具·····	010
二、材料·····	012
第二章 抚慰孤魂：祭厉与冥婚·····	016
第一节 祭厉·····	016
一、厉鬼·····	016
二、官方的祭厉·····	017
三、民众的祭厉·····	020
四、由厉至神·····	030
第二节 冥婚·····	035
一、冥婚的历史·····	036
二、冥婚的形式·····	037
三、冥婚的意义·····	041
第三章 禳鬼祈福：施孤和普度·····	044
第一节 施孤·····	044

二、国家颁布祀典..... 111

三、强化城隍信仰.....	113
第二节 毁淫祠.....	117
一、福建历史上的毁淫祠.....	118
二、毁淫祠流于徒劳之原因.....	128
第三节 余论.....	137
参考文献.....	143
后 记.....	167

第一章 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述评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对象

傩文化是一种远古的原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汪毅夫先生曾论云：“傩文化是一个庞大的载体。简而言之，傩文化包括傩祭（傩仪）和傩的观念（‘鬼无归则为厉’的设想、‘驱鬼除疫’的信念等），以及傩面具、傩戏、傩舞等。”^①傩，《周礼·春官·占梦》曰：“遂令始难欧疫病。”郑玄注：“令，令方相氏也。难，谓执兵以有难却也。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为之欧疫厉鬼也。故书‘难’或为‘傩’。”^②汪先生并指出：“鬼无归则为厉”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肯定早于它的否命题“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从古老的命题出发，围绕着假想中的“厉鬼”，各种想法、说法和做法彼此纠结，构成了各种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傩文化的复杂体系。^③

在闽台民间信仰^④中，有一种与傩文化相关的特殊形态——厉鬼瘟神信仰。这一信

① 汪毅夫：《试论闽、台傩文化的共同性》，氏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② 《周礼注疏》卷2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08页。

③ 汪毅夫：《傩：游戏与舞蹈》，氏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④ 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中佛、道以外的民众信仰时，学术界使用的术语并不统一，除了使用频率最高的“民间信仰”外，还有“民生宗教”、“民俗宗教”、“大众宗教”、“世俗宗教”等称谓。这些不同的称谓，既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民众信仰性质的不同看法，也展现了研究者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综合性的评述参见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5页；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17页。王铭铭：《宗教概念的剧场——当下中国的“信仰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第59—77页。

仰的产生，与闽台地区的自然、社会、历史等条件紧密相关。“瘟”又称“瘟疫”、“疔疫”等，指急性传染病之总称，包括鼠疫、霍乱、疟疾等病症。古人认为，瘟疫流行，是瘟神、疫鬼作祟的结果。汉刘熙《释名释天》云：“疫，役也，言有鬼行疾也。”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疫鬼的传说，说颛顼氏有三个儿子，死后变成疫鬼，一人居江水，是为疟鬼；一人居若水，是为魍魉鬼；一人居宫室及阴暗肮脏的地方，专门惊吓小孩。实际上，至迟在西周时期，百姓就对疫鬼产生极大的恐惧，经常要举行“大雉”仪式，驱逐疫鬼，可见瘟神信仰由来已久。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在古代福建，瘟疫经常流行。汉代淮南王刘安称福建为“呕泄霍乱之区”，直到唐宋时期，闽南地区仍被外省人视为“瘴疠春冬作”的是非之地。有关瘟疫流行、死者枕藉的记载在古代福建方志中随处可见，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记载的唐贞元六年（790）至清道光三年（1823）发生的“大疫”就超过30次，至于中小瘟疫的发生次数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此。尽管古代中医相当发达，但对瘟疫这一急性传染病却束手无策，一旦染病，十有九死，百姓极端恐惧，惶惶不可终日。所以瘟疫一旦发生，人们“谈瘟色变”，常常舍医药而就鬼神，纷纷到瘟神庙祈禳，或延请巫师到家中跳神驱邪，希冀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消弭瘟疫，逢凶化吉。^①台湾则一向被视为瘴疠之区，直至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台湾的瘟疫仍时常发生，有关方志记载的大瘟疫尚有二十多次，死亡人数数以万计。^②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闽台地区的瘟神信仰特别发达。闽江流域属于五帝系统，闽南和台湾地区的瘟神被称为“王爷”。

而厉鬼崇拜的产生，则与福建和台湾均为移民社会有关。福建和台湾在历史上先后经历过艰难的移民开发的阶段，台湾的开发主要是由福建移民实现的。移民的处境和心境极大地刺激了闽、台雉文化的发育，伴随福建移民的移居台湾则有福建雉文化的移植台湾。就可视的情节而言，从祖居地来到客居地，移民面临的生命威胁同内在的生存要求首先就构成了尖锐的冲突，雉文化缘冲突之力而盛；从福建来台湾，福建移民带动了福建雉文化的移植。在移民社会里，移民中有许多单身移民，又有许多移民死于瘟疫、械斗等灾难。^③死而无后和死于瘟疫、械斗的移民虽然属于“厉鬼”，却受到整个移民社会的同情。

本书题为“雉与礼的融合——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研究”，研究对象即是福建和台湾地区厉鬼瘟神信仰，包括以厉鬼瘟神为中心而产生的仪式和活动。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主要是闽台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在清代曾隶属福建整整两百年，直到光绪十

① 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② 参见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③ 汪毅夫：《试论闽、台雉文化的共同性》，氏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年(1885)才单独建省,福建和台湾本身就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①时间范围则比较宽泛,这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厉鬼瘟神信仰的产生和流变,视具体个案的不同,一般都涉及宋至清各代,有些还要向前追溯或向后拓展;其次,厉鬼瘟神信仰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式”,其具有连续性,仍存在于闽台两地的现代生活中;再次,记载厉鬼瘟神信仰的文献材料是凌乱分散的,如果时间范围太小,研究会面临史料不足的问题。而将时间范围放大,既可解决材料的问题,还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材料互相印证,加强对具体问题的论说,展现信仰的流变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此外,本书在行文中也会涉及厉鬼瘟神之外的闽台其他神祇和民间信仰现象,以便有所比较,互相发明。最后,本书在内容方面并没有穷尽闽台厉鬼瘟神信仰的全部事象(例如,对于闽南和台湾的“王爷”信仰没有设专章论述),而是采取分专题的写作方式,出发点是为了使研究更加具体,避免看似全面、实则流于泛泛。

二、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中说:

我们看他(中国人所供祀的神)受祀范围的广狭,年代的久暂,和一般民众祀他的心理,做成专篇,倒是宗教史里很有精彩的一部分。^②

做中国宗教史,依我看来,应该这样做:某地方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时代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时代的心理,这部分的叙述才是宗教史最主要的。……此种宗教史做好以后,把国民心理的真相,可以多看出一点;比较很泛肤的叙述各教源流,一定好得多哩。^③

梁启超对于民间信仰的重视是颇具远见的。自唐宋至今,福建一直是汉族地区民间信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民间信仰是闽台传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信众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民间信仰活动将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北方移民与当地社会、典章制度与民间习俗、精英与民众、宗族与个人联结在一起,是研究闽台区域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厉鬼瘟神信仰作为闽台民间信仰的一种特殊形态,又是研究闽台民间信仰的一个

① 关于清代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闽台关系和日据台湾时期的闽台关系,参见汪毅夫:《闽台关系研究的两个问题——写给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学术报告》一文,氏著《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3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4页。

很好的切入点。文化是需要表达的，多元的闽台民间信仰必定会带来多彩的文化表达。笔者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本研究将通过厉鬼瘟神信仰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与形态，探讨其与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社会群体、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探寻闽台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而在研究态度方面，笔者认同“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①，将遵循客观原则，既尊重祠神信仰者的信仰，也反对信仰主义。^②

（二）现实意义

民间信仰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如何正确对待民间信仰，关乎社会稳定。如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地方经验的多样性可为人们应对各种危机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这也是区域社会研究的意义所在。对闽台地区历史上厉鬼瘟神信仰的多元图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可以为时下全面观察和理解民间信仰提供历史的视角，对于完善宗教政策、创新社会管理或有借鉴作用。此外，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厉鬼瘟神信仰是两岸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这一信仰，特别是剖析两岸厉鬼瘟神信仰的渊源与流变，探寻其中的密切联系，对于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促进两岸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也将有所助益。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与讨论

本书的论题是建立在前辈学者和学界同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关于福建民间信仰，笔者已有专文进行回顾与展望，^③在此，仅讨论与本书研究对象有较紧密关系的成果。

在厉鬼瘟神信仰的性质方面。在已有研究中，论者多对厉鬼瘟神信仰持负面的看法，认为信民对于此种信仰对象的态度只是单纯的畏惧与憎恶，甚至用此观点解释祖先崇拜。^④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将民间信仰做“雉”与“礼”的两分。有学者认为：“中国

①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② 有学者曾论：“当然，尊重并不意味着绝对赞同对方。朋友之间的相互尊重是永恒的，但是有时候人们还是会有不同的见解，对于宗教研究的态度也应如此。尊重其他人的宗教信仰并不代表学者个人的信仰；但是尊重他人的宗教却是我们理解宗教与实践的入口。疏忽于尊重他人的信仰，我们就无法去理解、去研究，也没有理解的途径。”见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③ 参见庄恒恺：《福建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支平、李玉柱主编：《闽台文化的多元诠释》（2），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0—156页。

④ 如董芳苑就以“怖畏”来诠释祖灵的祭祀，参见氏著《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增订本）、《认识台湾民间信仰》（增订版），台北：长青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985年。

原始性的宗教活动，除了表现对神灵感恩戴德的敬畏内容外，还有表现为傩祭的驱鬼逐邪内容。前者表达了原始人将福祉归功于神灵的认识，后者则体现了他们将灾难归罪于邪鬼的观念”。^①如果说对于原始信仰活动做这样的分类是合理的，那么对于复杂的民间信仰、至少对闽台两地的厉鬼瘟神信仰而言，这样的截然二分是无法描绘其全貌的。对此，汪毅夫先生认为：

在闽、台两地的傩文化里，上古傩祭得到保存，也受到改造：改驱鬼为召魂、化干戈为玉帛、易驱逐为礼送、变冷遇为优待；经历了从刑到礼的改造，上古傩祭“执戈扬盾”、“索宝驱疫”的模式不是闽、台傩祭的基本模式，“礼”的穿插和充弥才真正构成了闽、台傩祭的特色。^②

汪先生在《傩：游戏与舞蹈》一文中描述了闽、台傩文化之两种事象——傩之游戏与傩舞，并论述：傩之游戏和傩舞也是庄严的驱鬼仪式，其营造和渲染热闹气氛的手段与所营造和渲染的热闹气氛，亦是出于驱傩的考量。^③他还对妈祖和莘七娘信仰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1. 认为莘七娘崇拜形成于北宋，与妈祖崇拜的形成大致同时。2. 通过分析历代文献所载《夫人月下吟》，指出莘七娘信仰经历了一个由鬼而神的变化过程。3. 指出莘七娘的主要功能与妈祖不同，不是拯溺济渡，而是御寇助战。4. 记述莘七娘与“五道圣七娘”异神同名、莘七娘神诞及宋代“显应”庙额分赐两庙等情况。他认为，“在客家民间信仰里，妈祖有如慈母，莘七娘则若侠女，在她们身上寄托了客家人善良美好的愿望。”^④

在冥婚方面。洪树华通过对宋以前文言小说的研究，探讨了冥婚所具有的文化意蕴。^⑤姚平、邓星亮研究了唐代的冥婚。^⑥黄景春分析了冥婚的历史、现状和产生的根

①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氏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0页。

② 汪毅夫：《试论闽、台傩文化的共同性》，氏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③ 汪毅夫：《傩：游戏与舞蹈》，氏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94—103页。

④ 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1—147页。

⑤ 洪树华：《宋前文言小说中的冥婚及其文化意蕴》，《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1—78页。

⑥ 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第68—74页；邓星亮：《唐代冥婚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源。^①顾春军考证了冥婚的流变。^②李全平对雁北地区的冥婚进行了考察,探讨了该地区当代冥婚大量盛行的原因和变化趋势及新型特征。^③在闽台地区的冥婚方面。汪毅夫先生分析了闽台冥婚习俗的形式。^④焦大卫通过对台南农村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冥婚的仪式,探讨了冥婚的意义。^⑤黄萍英论述了台湾汉人社会的女鬼信仰与冥婚习俗,着重研究了“姑娘庙”的信仰文化。^⑥此外,李南海在《漳州传统社会的冥婚研究》一文中,记录了漳州四区县的六个冥婚个案。^⑦

在瘟神信仰方面。关于五帝信仰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对福州民俗文化进行调查,详细列出了瘟神五灵公的“履历表”。^⑧同时期,陈贞瑞开创了五帝研究的先河。^⑨徐晓望阐述了瘟神观念的演变和闽人祭祀瘟神的源流,梳理了五通、五显和瘟神之间的关系。^⑩林国平论述了闽台两地的瘟神系统,分析了福建瘟神信仰对台湾的影响。^⑪王振忠考察了瘟神“五帝”信仰的由来与发展。^⑫宋怡明分析了福州的士人精英如何操纵对五帝等非正祀神明的崇拜,在迎合政府规范的同时,又保留了社区的传统,从而造成了标准化的假象。^⑬刘枝万认为,作为民间信仰对象的瘟神主要有六个阶段的演化过程:1.散瘟殃民之“疫鬼本身”,因此在此阶段之“瘟神”是散瘟殃民之“厉鬼”。2.取缔疫鬼,除暴安良之神,即邪恶疫鬼受封或被祭祀后,变为瘟部正神,故其行瘟对象势必有所选择,不得任意作祟殃民。人民对“瘟神”之观念,渐由“疫鬼本身”之原始形态蜕变为“疫鬼之管理者”,而赋予“代天巡狩”之瘟

- ① 黄景春:《论我国冥婚的历史、现状及根源——兼与姚平教授商榷唐代冥婚问题》,《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第97—103页;黄景春:《从一篇东汉镇墓文看我国冥婚习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41—45页。
- ② 顾春军:《“冥婚”流变考论》,《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第42—53页。
- ③ 李全平:《山西雁北地区当代冥婚现象研究》,《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第243—253页。
- ④ 汪毅夫:《略谈台湾民间的冥婚之俗》,氏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28页;汪毅夫:《闽台冥婚旧俗之研究》,氏著《闽台地方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7—92页。
- ⑤ [美]焦大卫著,丁仁杰译:《神·鬼·祖先:一个台湾乡村的民间信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96—215页。
- ⑥ 黄萍英:《台湾民间信仰“孤娘”的奉祀——一个社会史的考察》,台北县:稻香出版社,2008年。
- ⑦ 李南海:《漳州传统社会的冥婚研究》,《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第42—48页。
- ⑧ 刘强:《残山剩水之福建文化》,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编:《福建文化》,第1卷第9期。
- ⑨ 陈贞瑞:《“五帝考”发轫》,《民国日报》(福州)副刊《民俗周刊》,1930年第12、13和15期。
- ⑩ 徐晓望:《闽台瘟神信仰起源的若干问题》,氏著《福建民间信仰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96—116页。
- ⑪ 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2—100页。
- ⑫ 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6—170页。
- ⑬ 宋怡明:《神明标准化的幻象:中华帝国晚期五帝的信仰》,《亚洲研究期刊》,1997年,第113—135页;宋怡明编:《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资料汇编》,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06年。